
上海推进文化创新研究

徐翔¹

(同济大学 201804)

【摘要】: 上海在新阶段对文化创新的激发,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性参与和社区性文化再造,从社会型文化创新层面加强社会基础细胞的创新氛围和公众参与,充分挖掘街区和社区等城市细胞的创新环境元素,加强“文化型社区”、街区文化发展的质量及其创新生态的多样性。

【关键词】: 城市文化 文化发展 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 G12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9)01-0072-009

一、上海文化创新发展的现状与格局

(一)城市文化导向持续增强,显现出后工业时代“文化转向”态势及其创新发展动力

上海在国内城市中率先走出向服务业城市转变的步伐,经济由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城市、经济中心建设向第三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上海文化建设和文化城市的发展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知识、文化在上海发展中的特征也日趋明显。这是后工业城市发展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也符合国际发达城市的发展经验。“从战后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成长进程看,产业一般沿着轻纺消费资料加工业—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技术密集产业—服务业—知识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序列成长。”^①例如,上海杨浦区经历了从“传统工业区”向“知识创新区”的转型发展道路,出现了环同济经济圈、创智天地、湾谷科技等一批品牌标杆。在后工业时代和第三产业、服务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力量——城市文化的力量正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②。

文化生产是关系到文化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创新性文化内容和产品的基本土壤。上海文化创意产业2015年实现增加值2820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市GDP比重已达12%左右。截至2013年底,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名列全国首位。这些给城市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产业土壤和经济支撑。

尽管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位于全国城市榜首,但在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以及人均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方面,都低于北京、杭州、深圳。在全球城市的竞争中,上海的文化生产并不占优势。2012年亚太总裁协会发布的国际文化产业领军企业50强,涵盖出版业、传媒业、影视业、唱片业、动漫业和网游业等传播领域,包括时代华纳、纽约时报、维亚康姆、哈瓦斯、贝塔斯曼等国际传媒领军企业,其中纽约有18家,东京有9家,伦敦有4家,中国仅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影集团入选,而且其实力排名都在40位之后。^③上海没有文化企业入选。强大的文化旗舰企业 and 文化领军企业是文化生产以及文化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引导要素,上海在全球城市的文化创新竞争中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二)文化创新主体和创意阶层集聚,成为上海文化创新的有力支撑

基金项目: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编号2017-A-058)。

作者简介: 徐翔,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本文参与撰写人员:万珂、陈立生、韩亚辉。

上海文化人才和文化创新主体在国内显现出引领性的地位,在艺术家与文化组织、文体娱从业人数、大专学历以上人口比重方面,除次于北京外,均领先国内其他城市。上海高等院校、创意空间等吸引了大量文化创新人才的入驻,逐渐形成扩散和辐射效应,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转型。

文化增长规模的积累为上海文化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动力模式转变提供了条件,也向注重文化产品内涵和创新品质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在资本驱动和内容产业已取得主要驱动地位的基础上,上海的文化生产开始强调其创新和品质方面的竞争力,促进城市文化的进一步转换升级。彼得·霍尔认为城市包含着“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递进的不同阶段,其中文化在城市的生产、技术、知识、智力创新中的地位随着阶段提升而更加凸显。近年来,上海充分发挥人才、知识、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加大文化增长中的创新力比重,在国内率先提出实施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战略,着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之城。

(三)城市更新中的文化导向得到重视,为上海文化创新提供有利土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和对城市化质量的重视,上海逐渐迈入具有显著文化比重的“文化转向型城市”阶段,城市的文化与个性、特色等进一步得到强调。2002年上海启动“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计划”,将原有的生产空间转变为具有文化旅游、生态居住等功能的城市中心活力空间,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复兴。徐汇滨江地区以文化产业为先导,利用大量历史建筑、工业建筑遗存,依托滨江剧场和文化主题公园等建设项目,开展多样化文化交流活动,打造充满创新气息的建筑、活动和文化产业的空间,打造具有文化艺术品位和区域特色的空间和“文化走廊”,形成包括西岸艺术中心、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西岸美术馆、油罐艺术中心、叁美术馆、水边剧场等在内的文化高度活跃和集聚的文化中心,为上海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提供重要的空间土壤。2010年上海市政府批准的《外滩金融集聚带建设规划》,对南外滩滨水区加以注重文化要素的改造,重点聚焦历史文化、公共活动等方面,充分利用中山南路和黄浦江之间滨江地区的滨水资源和历史特色,形成开放、活跃、人文的滨江地带。在思南公馆的历史文化街区的重建中,对传统城市历史特色与现代时尚商业休闲空间相结合,形成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充实与创新,为大众提供更高品质的交流共享空间。在以工业区的文化改造方面,桃浦工业区实践了包括古镇文化、工业文化和创新文化在内的文化更新,将创意时尚、艺术文化、科技信息、低碳环保与公共空间相结合,推动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使得原本只注重物质更新、面临严峻经济和环境问题的老工业区逐渐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四)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品质的提升,为上海文化创新提供公众基础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致力于推动探索城市空间的重塑及其对城市转型发展的意义。空间艺术季大规模聚集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家、建筑师等,并与市民活动结合,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平台。2017年第二届空间艺术季讨论如何将各种断裂的公共空间转化为连续开放、可达舒适的人性化、高品质的公共空间,通过跨领域和跨学科的艺术呈现、公众参与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将艺术和规划、建筑等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与市民“连接”在一起,重塑公共空间和共享公共空间的未来。

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等是一个富于创新活力城市必不可少的要素。上海有公共图书馆238个,每10万市民拥有1.2家图书馆;剧场135个;博物馆125家,其中免费开放96家,每20万市民拥有1座博物馆;美术馆76家,涌现出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等近30家民办美术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16个;东方社区信息苑379个。王悦荣在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省际比较中,设置了“传播力”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七大二级指标之一,其主要内涵意指公共文化的服务供给力度和人均效能。在由“人均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人均公共图书馆书刊文献外借册次”“人均公共图书馆流动图书馆车书刊借阅人次”“人均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举办展览次数”“人均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人均文物陈列展览参观人次”等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传播力指标中,上海高居榜首。^①

同时,公共文化设施及其服务体系的发展,也为促进公众性文化创新提供了有力基础。上海图书馆于2013年推出“创·新空间”,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界率先引入“创客”概念,以创新型活动项目为载体,以馆藏文献、数字技术、创新工具为支撑,营造学

习交流、信息共享的复合型新空间和创新者的孵化空间。2015年,上海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5万余项,群众文化创作作品1000多件,使2900万群众受益。上海设立了达千万元的上海市公益性演出专项扶持资金,在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等十余家剧场组织上千场文艺演出和讲座,加深了市民群体的文化体验。

但在公众参与和文化的社会土壤上,与国际发达文化城市相比,上海的公共文化环境仍显不足。伦敦发展署公布的研究报告《伦敦:一次文化大审计》,把上海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4个世界级城市相比较。在国家级博物馆数量上,最多的伦敦有22家,上海只有6家;每10万人口所拥有公共图书馆数量,伦敦有5个,上海有1个;公共美术馆数量,东京有40家、巴黎有59家、伦敦有92家,上海只有6家;上海大型剧场年人均入场次数仅有0.4次,是纽约、伦敦的1/4。城市公共文化投入是关系其活跃与保障的重要因素,在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比较中,上海虽然在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比重这项指标上高于伦敦、东京和纽约,但公共文化支出、人均文化视野经费都大大低于巴黎等城市。

(五)文化作品和产出逐步提升,增强上海在文化创新方面的引领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突出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支柱作用,在市场体系健全、文化人才涌入和文化创新推动下,呈现出一系列有质量和优秀内涵的文化产品,体现出具有创新特质的文化影响力。2014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发放资助金额达1.56亿元,大大激活了城市的原创力。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市文广局牵头设立了上海扶持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资助额度为每年2500万元,主要采用资助方式,每年扶持3~5部重点精品影片的拍摄与制作;重点培养优秀青年电影人才,扶持4~5部新人新作。2014年在全国各重要评选、评奖中获得奖项的上海主创作品,均获得过基金专项的资助。2014年10月,上海10个街镇被文化部命名为2014—2016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截至2017年,上海1873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制作完成电视剧集数连续5年处在全国前列。但在最为核心的原创力上,上海依然存在不足。以影视内容的生产和供给为例,上海一档获得高收视率的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全套拷贝自伦敦的原创节目,其中西交融的碰撞没有衍生出足够多的和新的文化,在看似新颖的光环下流露出一定的文化原创力的缺失。

二、上海推进文化创新的制约因素

(一)文化发展中过度重视经济导向影响文化内核的发展与创新

上海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容遗失”。在历史文脉的传承中,上海旧城保护开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之间仍存有一定矛盾。例如,新天地地区在商业化的操作中,虽保留了石库门的外观,内容却改变了,逐渐失去了原住居民文化的内涵。上海音乐厅移建后,原有的文化环境消失了。泰晤士小镇、荷兰风情小镇等注重街区建筑的异国形式而缺乏实际的文化内涵。以拥有同乐坊、800秀、源创等创意产业园区的江宁社区为例,原本应当是主角的创意产业却在几轮商业运作之后沦为配角。^①同乐坊中时尚餐饮占30%、俱乐部占50%、零售概念店占20%。在文化创新中,经济思维主导的倾向加剧了文化内核的缺失。“文化资源的运用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目标的制定上,过于狭窄地关注文化的经济效益不能真正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②

有些地方对一些文化活动和文化节庆品牌的建构,注重形式,注重“活动”,甚至注重“娱乐”和“创收”,而忽视这种文化活动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底蕴。在对文化创新的评价上,过度的商业导向和经济导向问题同样存在,“文化英雄”和“创新英雄”不如商业英雄,也不如流行偶像。这些都会影响上海文化创新的长远发展。上海需注重协调文化创新中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发展的关系,避免文化创新中的“价值遗失”与“内核缺失”,以推动上海文化品质的提升。

(二)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是上海打造卓越创新文化所需

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彼得·霍尔对跨时2500年的一些著名城市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城市在发展中“黄金时代”爆发的创造力,

依赖于某个地方的某一群人:各种各样的人聚集交流,不断地创造着“新事物”,他们中有企业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民族,将不同文化集中在一起,不同文化的融合碰撞,为创新提供巨大的动力。具有文化创新活动的城市,要海纳百川,容纳各种文化,让各种文化基因相互碰撞。在外来人口所构成的“熔炉指数”方面,上海与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城市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外国人在沪就业人口中,接近一半的外国就业者从事服务业,涉及租赁和商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领域。^③从国外人口与城市融入来看,政府曾主导为国际人士设计诸如老外街等文化一条街,但反响一般。上海在多元文化环境的构建方面仍存在服务不足,如城市便民服务缺乏多语种信息。从外国人在沪就业人口的产业比例来看,以经济、管理类以及技术类居多,文化艺术人口的比例还有待继续提升。文化艺术人口对激发一个城市和地区在多样文明碰撞中的发展,往往起着有力的催化作用。

文化多样性也常常体现为各种非正式、非主流的亚文化和小众文化,它们构建着城市独有的文化氛围,为文化碰撞和融合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多样化人群对激活城市创新活力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需要少数民族文化、活跃的街头文化、先锋文化、草根文化等,形成异质性而具有活力的生态圈。

(三)营造社会参与、万众创新的充足文化活力和创新动力

在上海文化创新中,社会及公众的参与应是推动城市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在社区中,尽管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文化环境的改善,但社区文化活动仍然偏少,邻里之间形同陌路,一些社区并不能针对不同人群提供相应的基础文化服务,缺乏人文关怀。一些区域的文化建设中,往往忽视与市民和社会公众的联系,“旅游化”“地标化”等倾向较多。例如,20亿元打造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再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建成二三十家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和各类文化休闲场馆,但是“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目前最多的是以收藏为名的所谓古玩商店,文化功能较为单一,偏重于商业贸易。以名人雕像为主体的布景化空间、植入式街区改造方式,尽管创造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文化名人街”,但却割裂了当地的社区网络,居民对这里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环境缺乏参与热情。2016年一份对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进行旅游开发的研究指出,通过对衡山路复兴西路、愚园路、山阴路、新华路等海派历史风貌区的社区居民调研访谈,发现原住民更喜欢原生的状态,不会因为发展旅游而对社区更满意。^④就文化企业和文化创意园区而言,社会性的文化创新土壤尚未建立起来。在上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创作中,占有主要地位的仍是文化创意园区各种产业主体。上海诸多文化创意园区仍主要以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或开发商的开发为主,依托产业动力,吸引艺术家、艺术机构、设计公司进驻社区,而断开了一些园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也缺少公众参与,这不同程度地带来文化创意园区的孤立化和空心化,使得这些文化创意园区很难发展出具有深度影响的独特文化。

(四)文化创新人才的生存发展环境及其可持续性

上海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先后发布了《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紧缺人才开发目录》《上海市文化创意重点人才开发目录》等,加大了对文化原创人才、高端人才、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的挖掘、引进、交流、培养和服务力度。然而,大都市的生存环境、文化街区的“地点质量”等因素,仍然制约着文化创新人才的存留及其发展。上海几大耳熟能详的文化创意园区如田子坊、同乐坊、老码头、1933老场坊等,商业比例都已经超过了50%,越来越多的商业配套以租金上涨的形式挤掉了创意园区中原本应为主角的文化创意阶层和创新群体。在田子坊的“重获新生”中,早期画家和艺术家的入驻成就了田子坊的最初策动力,但随着田子坊知名度的提高,高租金导致累积多年的艺术家资源流失。同乐坊、红坊等原本是创意人士聚集的场所,但其租金远比同区域的普通办公楼高,有的甚至高出陆家嘴地区的部分写字楼。如何为文化创新人群保留其真正适合于生存与创新的都市环境,保留都市区的创新活力,而不是让他们被生存压力所驱逐,是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此外,对文化创新中虽有潜力但现状仍不成功的“新人”需要更多的新人辅助计划和政策、资金支持。

(五)文化创意园区其品质和内涵有待继续提升

上海文化创新离不开文化创意产业和各种各样的文化创意园区。文化创意园区在汇聚人才和企业、打通产业链与价值链、塑造创新品牌、形塑创新区域等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文化创意园区的空心化以及注重物质外壳而忽视文化内涵等方面,以及在吸引创意阶层方面,都还存在着不足。其中,多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入驻率偏低,尤其是边远区域的,存在着地产化和商业化倾向,文化创意元素往往居于次要或点缀。多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偏于单一主题,创新生态未能有效建立,如张江科技园主打软件、游戏等,但并未加入创意和时尚元素,其功能和创新品类构成显得过于单一,这不利于园区的创意灵感产生和文化创新生成。虽然大部分园区有其明确的主题,如专注时尚生活服饰设计的尚街 LOFT、突出时尚艺术文化的 M50,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园区存在着主题不清晰的情况,这不仅不利于产业化的经营,在事实上也不利于创新文化要素的集聚。一些文化创意园区配套服务不够完备,影响到创新人才的持续驻留。部分园区同质化严重,其运维的模式、发展理念基本是相同的,在布局、主题等方面存在类似性,缺乏深度的个性和不可复制性,在真正富于活力和爆发力的创新品质营造方面还存有差距。

(六)对市民的主体需求要加强回应

就公共文化建构而言,尽管上海在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着力提升文化的基本性、公益性、共享性,但其主要标的更多的仍是城市的文化形象、城市收益而非以人群和公众为导向的文化效益。花大成本和资源配置下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由于未充分满足群众自下而上的差异化文化需求,利用率不高乃至闲置的情况屡有发生。例如,上海市民文化节是充分调动民众文化参与、丰富市民文化的一项公共活动,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举办过程中,未能充分回应市民需求、“叫好不叫座”的现象依然存在,而白领群体和高校师生等作为上海市民主体中的重要构成其参与度也不高;文化讲座、农家书屋投入了不菲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但有较大部分的内容和设施并不符合民众需求。文化建设如果不能充分地、切实地转化为扎根深入的人文城市构建,势必影响上海的城市文化质量和创新能力。

三、推进上海文化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城市中的文化多样性生态,塑造面向国际竞争的具有高度活性的创新环境

作为建设中的全球城市和国际文化大都市,需要对多样文化的培育和促进,并把它们转化为上海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行为是一种非规范的突发性行为,创新构想的产生往往需要多种不同观点和不同文化元素的相互启发,以创新为导向吸引各方人才,通过面向全球的开放带来多种文化和视野的交融,以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强调城市人口的多样性,大幅度加强外来人口以及“新移民”的比重,为外来人口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在古北、碧云、龙柏韩国城等国际社区和国外居民聚集区域,可以加大与国外居民的适应与匹配,增加他们对街区设施、开敞空间、服务环境、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吸引国外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在上海工作或定居,使上海在多样文化碰撞和融合中焕发出更强的创新活力。

进一步挖掘和发扬上海文化里固有的“海纳百川”等基因,在这些地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开放的多样化文化软环境。加强对市民草根文化和亚文化、先锋文化、小众文化的支持。发达国家文化发达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强调满足城市基础细胞的多样化功能与文化需求,其基层和街区的公共艺术、草根文化、休憩场所、节庆活动、小微公园体系等具有丰富的形态和发展程度,为其城市文化带来了充分的活性。伦敦市明确将支持草根文化写进了文化多样性发展议程之中。民间志愿者团体、社区组织、俱乐部和协会、自发的艺术和音乐聚集地、艺术节和民间的合唱团、乐队、工作室等,为城市提供了文化活力源泉。先锋文化也因其探索性、实验性往往成为刺激文化变革和创新的重要爆发因素,构成文化多样性生态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以及上海公共文化仍以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为主,需要在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外,对民间自发的公共文化和草根文化、“小微文化细胞”加以引导和扶持,如资金、场地的资助。一些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聚集点,政府部门可以有选择性地给予支持,使其发展壮大,成为类似于巴黎蒙马特高地、纽约格林尼治村等的文化区域。同时,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发放方面,除了政府官方的审核机构外,实施“中间计划”,增加社会组织分担文化基金的审定和拨款职责,这有利于扶植多元文化,为城市的小微文化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孕育土壤。

(二) 打造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文化艺术聚居区和“全球城市”复合型文化区

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突出产业和经济导向,功能较为单一,其中工作和居住往往是分离的,多种因素使之难以形成非常紧密的非正式联系和社会纽带,这也影响了文化交流和创新。上海光有围绕产业主题而形成的文化艺术园区是不够的,还必须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在功能和主题上具有非单一复合功能的文化聚居区。这样的文化区域,能形成具有紧密的非正式社会联系的文化创新策源地。例如,巴黎的左岸曾以其独特的高等院校、艺术机构、咖啡馆空间等,成为文化人士活动的公共领域,它并非为了某种产业目的,但构成了巴黎文化创新的显著活力。上海需要改变注重商业化和产业化的文化开发模式,为创新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上海应面向全球城市和国际化文化大都市的定位,以高等院校和现有创意园区为基础,打造适宜文化创意阶层居住、文化活动和文化联系频繁、创新辅助环境和服务较为完备、对全国乃至国际文化艺术人才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文化艺术聚居区。在上海环同济设计创意产业集聚区和上海大学周边等现有的区域基础上,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及其服务水平的提升,有意识地引导更多的文化艺术人士和创意阶层入住而非“入驻”,逐渐形成上海知名的都市“文化圈”,以推进文化名城建设。

针对当前上海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等现实困难,以及它们对吸引创意阶层的持续居留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建议在都市非中心和次中心地区,加大面向文化创意人士聚集生活居住区域的构建,推动建设艺术家小镇和特色性文化群体聚居区。围绕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等区域重点打造戏剧街区;为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文化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培育未成名艺术家较为集中的“波西米亚”区。通过这些文化艺术居住区的打造,增强上海对多种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即使暂时不具备产业开发和商业价值的文化艺术人士、组织、活动等可以在上海找到驻留的居所和空间。

(三) 充分挖掘社会性的文化嵌入及其创新活力,塑造立体化的文化创新之都

上海在新阶段对文化创新的激发,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性的参与和社区性的文化再造,从社会型文化创新的层面加强社会基础细胞的创新氛围和公众参与。充分挖掘城市中街区和社区等城市细胞的创新环境元素,加强城市中“文化型社区”、街区文化发展的质量及其创新生态的多样性。

根据上海的文化底蕴积极引导和塑造“一社一品”“一街一品”或特色文化创新街区,使产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精英文化与日常文化形成密切的联动与激发。例如,对“建设宜业宜居的现代化科技城”的嘉定区而言,基于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和汽车城等资源和优势,可在生态宜居型城区的基础上,注重汽车城和科技城的现代文化氛围建构,塑造具有上海特色的汽车文化创新街。静安区江宁社区汇集着800秀、同乐坊、源创等多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时尚创新与社区的休闲游憩、会展商务、节庆活动、日常生活的融合,打造具有影响力、辐射力的时尚文化新型社区。上海有多个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展起来的创意产业园,如长宁区天山路依托东华大学、上海服装研究所形成的时尚产业园区,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天山软件园等,在这些具有文化底蕴或创意特色的街区和社区,探索建设开放式的创意街区,吸纳除产业主体之外的多种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以实现创意园区的社区化、创意街区的生活化、创意经济的社会化。

对既有的创意园区乃至创意街区的封闭式或半封闭式文化创意空间进行范式更新,把社会开放式置于突出和优先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无缝嵌入周边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的载体,打造原住民、创新人群、政府和服务机构、创新产品和对象共同构筑的文化生态圈。根据上海市科创中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众创空间累计500余家,形成了咖啡沙龙、创客、创业教育、创业媒体等多种孵化模式⁽¹⁾,如上市新三板的“苏河汇众创空间”,大虹桥区域的方糖小镇、优客工场、纳什空间等。这些新型众创空间尽管注重社会自治和社会参与,却依然难以避免房产出租、缺乏众创氛围等问题。在社会型创新的基础上,使众创空间真正形成具有强力的社会嵌入性创新区间。增强社会型创新环境的开放性,使更多人包括普通市民和边缘人群都可以广泛纳入和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这也是保持城市文化创新持久活力的基石。

(四)探索建构具有高度文化和创新品质的都市“小微生活圈”

创新型城市需要有富于质量的地方环境,如便于交流和触发灵感的街角的咖啡馆、书店、文体娱乐设施、多样化和人性化的街巷、公共艺术等。2005年城市工作专题组发表的“迈向强有力的城市复兴”(Towards a Strong Urban Renaissance)报告中指出,城市复兴的意向是经过良好设计的、紧凑的、互为联络的城市,可支持广泛的用途,包括人们居住、工作和在很近的街区享受休闲时光。吸引创新人群和“创意阶层”的,除了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平台之外,这些体现独特气质的创新环境往往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而言,“‘创意园区’会形成相应完善的生产链,效率高,但生产与生活是脱离的。现有大多数‘创意园区’仅是作为创意人士的工作场地而已。”^①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区需要对城市中日常生活的融入,它“表达了一种创意性的生活方式,多元的咖吧文化、活跃的创意社群、频繁的创意活动构成集聚区的主体单元,创意成为区域内一种普及性、开发式的、大众普遍参与的活动。”^②要因地制宜,打造适合自身特点的“创意地点”,增强文化创新的活力。在文化和技术人士较为密集的城市中,进一步增加公共文化空间的分布,创新其形态和提升吸引力,把各种“创意地点”如公共的文化交流场所、滨水文化广场、休闲文化场馆融入市民生活之中,营造富于活力、人性化界面、创新特质的都市“小微”体系。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下,上海有必要把更多目光投入到营造具有公共性的“创新空间”,而不是单一地完全由其市场化发展和产业化运作,否则可能走入“创新空间不创新”的老路,要真正地使之成为激活城市创新的具有弹性和自由度、充分碰撞的公共创新空间,推动历史街区建筑和重要文化设施的生活化开发和游憩空间构建,建立具有地方文脉和创意元素的活动区域。在上海现有的消费商务区、公共空间、区域中心活动、历史文化地段、广场街坊等范围拓展文化创新活动区的建设。

加强文化发展中的产城融合,对文化产业的生产环境赋予更加生活化和人文化、具有归属感的关注,注重产业园区中的街头文化、社区文化廊道的建设。在快节奏的大都市环境下,上海应对松江、宝山、嘉定等区域,依托研究型大学和文化园区,推进“慢城区”试点,着重于公共文化空间的人居化改造、“慢行”系统在该地区生活圈的串联等,积极利用上海城市的慢行系统和步道、水岸等串联创意场所和生活空间,注重社群对于本地区认同感的建构,增强区域对创新人群的吸引力和持续的集聚效应。

(五)强调文化创新的包容性增长和人本主义回应

一个城市的文化创新,不能以割裂与城市生活、市民的关系为代价,而是恰恰相反,在与城市的融合中达到相互促进和激发。城市文化的创造、生成以及其活力的构建不能脱离市民这一基本承载。黄鹤在总结西方城市发展时指出,“在城市发展中如果仅仅将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的‘引诱者’,而不注重文化潜在的精神作用、注重回应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这样的文化发展即使能够实现一定时间内的繁荣,但是之后会面临长久的困境。”^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同样,文化的发展也必须体现对多种人群和市民主体的包容性和平等性。巴黎、华盛顿等城市都积极促进城市对于市民群体的文化满足,及其充满活力的群体文化氛围的培育和激发。

在文化项目中,上海应避免开发和建设的“孤岛化”倾向,加大文化项目与周边环境的融合以及各类阶层市民对其的共享。文化的创新和创新的文​​化离不开“人”的参与。文化空间、文化成果、文化共享等需要充分考虑各类市民在活动、交流、生活中的需求,形成具有人文氛围的创新文化。受到项目周期和范围等因素制约,上海当前主要城市设计项目与大多数市民日常生活环境的直接关联度不高,市民也缺乏渠道参与身边一些文化场所、空间等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以上海城市休闲空间而言,居民首选游憩空间仍是绿地,其次是风景区、文化博览场所,室内体育场所与滨水公共空间排在最末。^④这反映了文化场所与居民生活之间的融合,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还有待加强。对文化项目包括文化创意园区的建设,需要强调文化在经济导向之外的社会效益和综合价值,强化公众在文化发展中的推动力、参与性和共享度,更好地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推动上海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在新阶段的转变与升级。

(六)加大在文化项目建设中的特色性规划

卓越的文化创新城市需要带有自身标识、蕴含自身文化气质的文化项目,而不是雷同化的设施。对上海而言,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同样离不开带有自身鲜明特点、难以复制的文化空间和文化要素,它们体现着上海鲜明的文化禀赋和资源特点,成为一个城市对外部具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坐标。

上海拥有广阔的近郊区,其中一部分具有丰厚的特色文化资源,以及聚集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企业 and 创新阶层的潜在禀赋,可对其进行特色“创意小镇”的建设与开发。在上海中心城区面临交通拥挤、居住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这也为暂时不具备显著商业价值的文化人群提供可包容性的生存空间。同时,这也为上海的文化创新发展赋予新的增长点,以多种特色文化激发上海城市的创新活力。奉贤陶瓷艺术园区、金山农民画、南汇新场民间技艺文化、车墩镇影视文化等,都是可资开发的上海地方人文资源,它们吸引更多的创意阶层和引导创意企业入驻后,加以整合提升,形成上海文化产品和文化辐射力中的亮点地标。利用地区文脉和文化设施、资源,培育和打造“特色文化街区”,注重“一街一品”“一社一品”特色创新街区的塑造。这些文化街区将促进地区的文化生态健全,同时保持其自身的异质性。上海具有丰富的滨水文化特征和底蕴,应打造有特色邻水型文化带。其中,黄浦江和苏州河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如众多的码头文化遗迹、工业遗存;上海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等非遗项目与浦江文化相关的超过半数比重,如上海港码头号子等。这些都是其发展邻水文化集聚带的有利资源。此外,青浦“水城融合”等方式也具有其发展特点和文脉底蕴。目前,黄浦江和苏州河水系已初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园区和集聚区,可结合邻水的空间特点和格局,如滨水文化消费区、滨水公共空间等,对之进行主题整合与布局优化,实现从集聚区向“功能区”整合,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上海“邻水型文化创新带”核心区。

注释:

- 1 沈山、安宇:《和谐社会的城市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76页。
- 2 吴缚龙、李志刚、何深静:《打造城市的黄金时代——彼得·霍尔的城市世界》,原载于《国外城市规划》2004年第4期。
- 3 《国际文化产业领军企业 50 强榜单出炉》,中国经济网,http://district.ce.cn/zg/201209/03/t20120903_23643782.shtml。
- 4 王悦荣:《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省际比较》,原载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 5 上海招商网,《商业比重过高,喧宾夺主》。<http://www.zhaoshang-sh.com/zhuanti/cyyqjjzml/2011/9-16/11916135649A7JGDAKAOEEBDI79C785.html>
- 6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67页。
- 7 黄祖宏,高向东,朱晓林:《上海市外籍人口空间分布历史变迁研究》,原载于《南方人口》2013年第3期。
- 8 张萌、汪舒:《上海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社区原住民满意度及流动性意向研究》,《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7住房建设规划)》,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 9 《众创空间,怎一个乱字了得》。<http://news.hexun.com/2016-11-28/187090808.html>
- 10 胡沂佳:《从“创意园区”到“创意社区”:山水杭州的创意之道》,原载于《时代建筑》2010年第6期。
- 11 王慧敏:《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3.0理论模型与能级提升——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例》,原载于《社会科

学》2012 年第 7 期。

12 黄鹤：《文化政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原载于《国外城市规划》2006 年第 1 期。

13 归云斐：《上海市民游憩需求偏好研究》，原载于《上海城市规划》2016 年 3 期。